

# 对中美关系的再思考

倪世雄 庄建中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了中美关系风风雨雨50年的历史,对当前中美关系进行了再思考,着重讨论了:国际大背景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中美关系的经济基础;解决中美关系的分歧的三项原则等涉及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问题。展望21世纪,作者持乐观态度,相信中美关系总归会好起来。

**【关键词】** 中美关系 历史回顾 现实问题 前景展望

## 中美关系风风雨雨五十年

在20世纪下半叶风雷激荡的国际舞台上,中美关系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也是最难处理的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经过了一个曲折反复、跌宕起伏的历程。中美关系这50年来,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1949-1972年的对抗阶段;(二)1972-1979年的正常化阶段;(三)1979-1989年的发展阶段;(四)1989-1996年的困难阶段;(五)1997-现在的关系改善和曲折的重建阶段。

回顾中美关系的曲折历程,可见一个好好坏坏、时好时坏、不好不坏的发展轨迹。有人说,中美建交20年似乎出现十年一次大波折的周期性现象。1979年中美建交,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十年后,1989年“六·四”事件使两国关系陷入严重危机。从1989年6月至1999年5月,正好又是十年,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严重倒退。还有人说,中美关系总是春天变坏,秋天变好,比如,1997年春天,一本《即将到来的美中关系》掀起一阵反华噪音,但到

了秋天,江泽民主席访美成功,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1998年春天,冒出了“政治献金案”和美国劳拉和休斯两公司的技术泄露案,恶化了中美关系气氛,但到年中,克林顿总统顶住压力,如期访华,取得积极的成果。今年春天,中美关系又经历了严重危机。这是自1949年以来的第五次危机(1951年朝鲜战争、1958年台海危机、1989年“六·四”事件、1995-1996年台湾危机)。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它能不能度过这次危机,在今年秋天两国首脑新西兰会晤时出现转机?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是什么?在21世纪到来之时,对中美关系的前景以及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应进行冷静的思考,理性的思考和深入的思考。

## 国际大背景与中美关系

观察中美关系,离不开国际大背景的分析和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因为,当代的大国关系是相互影响的。中美关系既受到各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又对各种国际因素产生反作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两极对立的时代。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美中关系自然

不会好。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对外扩张势头上升。美国和中国为了制止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中苏美三角战略关系形成,美中合作关系得到加强。

1989年,苏联东欧剧变,原苏联面临解体,加上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原来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开始削弱、动摇,美中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1999年,人类正走向新世纪,国际关系面临重大调整。一方面,出现了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另一方面,经济的区域化,国际政治中的单极化倾向也有所增长。美国霸气十足,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抬头。在各种政治力量极其尖锐的较量和斗争中,国际舞台上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局面,中美关系自然也受到这种大气候的影响。

处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战略选择是推进多极化,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而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一个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美国现正处在新的经济增长扩张期、战略扩张期。它依仗自己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样,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必然会贯穿于中美关系的全过程,称霸与反霸的斗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说到底,中美冲突的基本原因在于此。

然而,尽管矛盾与冲突不断,有时还很尖锐,但是中美关系不会破裂。因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这是一个大趋势。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全人类的进步,为了两国的繁荣和稳定,客观上要求美中两国进行接触,而不是对抗,这是两国的共同的战略职责和共同利益所在。

当今世界上美国搞单极世界困难重重,美国的战略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多极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但多极化的趋势是不可抗拒的。诚然,当今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是任何别国无法代替的,而美国要扮演世界领导的角色,就必须与各大国搞好关系,尤其要与中国搞好关系,这也是历史的客观需要,是一个不能违背的规律。

基于上述对国际格局的分析和对国际关系的思考,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便是在今后的岁月里,中美关系仍然是冲突与合作并存,以合作为主。中美关系仍然会向前发展。10年前,当中美关系处于低潮时,邓小平就以乐观的态度提出:“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sup>[1]</sup>

## 再议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美国5月8日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发生后,美中之间“战略伙伴关系”这个字眼,很少在媒体中出现,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

在1997年10月29日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慎重宣布的“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可能性是否仍然存在?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应该说,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的明确定位,是1997年10月中美首脑会晤的重要成果,它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框架。这两年的实践证明,只要双方都遵循这一原则办事,在这个定位中把握和处理两国间存在的问题,中美关系就能在21世纪沿着正常发展的轨道前进。反之,中美关系就后退、下滑,甚至走向破裂的边缘。

从理论上讲,战略伙伴关系对21世纪中美关系的界定是科学的、准确的、精辟的。这种伙伴关系有别于冷战时期大国间的不正常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其基本特征是:“发展友好,不搞对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不针对第三国”。<sup>[2]</sup>

有人说,现在中美关系这样糟,还谈什么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不错,中美关系现在并不好。但是,联合公报中并没有说现在中美之间建立了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它是在21世纪的一个长期的任务和目标。双方领导人早就有这种预见:1994年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告诉克林顿“两国是互利合作的伙伴”,“中美之间应该并完全有可能建立建设性新型关系”。<sup>[3]</sup>当时,克林顿也回应说,展望下个世纪,美中两

国有着彼此成为良好伙伴的前景。

两国的外交家们便更务实了。1997年7月24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洛杉矶发表的演说中提出建立“面向未来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设想。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对美方的建议作了积极的回应,但提出要加上“建设性”这个限定词,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这半年来的风风雨雨,使这种设想和前景受到危害。这说明美国在与我们谈伙伴关系过程中有言行不一的地方,说明建立伙伴关系的主要障碍在美国方面,说明要实现建立伙伴关系的目标并不是一件易事。可见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友好合作,稳定国际关系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了斗争的过程。

五十年来,美中两国经历了建国初的敌对关系、互不往来的阶段;又经历了70年代末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战略合作阶段。如今,面向21世纪,中美两国应该朝着“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前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

## 日益密切的中美经济关系

当有人把当前的中美关系看成是漆黑一团,毫无希望时,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却说:应该说,目前的中美关系在外交和安全上处于低潮,而在经济和贸易上还是处于高潮。<sup>[4]</sup>

奥克森伯格的这段话,是客观公正的。他不仅告诉人们看问题不能只看黑暗的一面,还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我们尤其应该看到经济和贸易是两国关系的纽带,是牢不可破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树立我们搞好中美关系的信心。

中美经济关系源远流长。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驶达广州,开始了两国间的贸易。到1918年,两国贸易额已超过了1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成了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市场。1946年,两国贸易额达4.2亿美元。即使在1950年,双边贸易额仍维持在2.88亿美元的较高水平。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贸易遂告中断。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恢复了双边贸易,年贸易额仅为0.129亿美元。到

中美建交的1979年,两国贸易额已达24.5亿美元。在整个80年代,中美两国经济贸易不断发展。据中方统计,1988年双边贸易已达100亿美元。<sup>[5]</sup>到1998年,中美贸易总额接近500亿美元,中美建交20年中增加了20倍。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双方在战略、政治、外交等领域矛盾重重,斗争不断。但经济联系总的呈加强趋势,两国的实际经济利益已开始超越地理、文化乃至政治的领域,成为两国关系中的又一重要支撑点。“今天,完全可以这样说,中美经贸合作在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方面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sup>[6]</sup>

当今世界上,经济因素在国家关系和国际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正如江泽民主席所说,“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经济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首要的、关键的因素。”<sup>[7]</sup>美国总统克林顿也承认,“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显著的经济增长有三分之一以上归功于贸易。”“中国已经是我们发展中最快商品和服务市场之一。展望新世纪,这个市场显然支撑着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数十万个就业机会”。<sup>[8]</sup>

经济是美中关系的基础,是纽带,是明天。邓小平指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在今后较长时间里两国经济不存在激烈的矛盾,因为互补性会较长时间存在。更重要的是,发展经贸关系不仅符合两国的国家利益,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今年上半年,尽管美中关系不好,美国政府仍决定给予中国正常的贸易国待遇,而且在国会通过也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今年11月底在世贸组织贸易部长西雅图会议上通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可能和机遇仍很大。中国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就可以得到更深更广的发展,这无疑会成为新世纪的美中关系助推器。

## 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中的分歧

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的原则分歧。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否认

的客观存在。其基本的特点是：第一，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这一特点决定了中美关系之间有许多重大的、重叠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它们构成了合作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由于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一样，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迥异，两国之间出现分歧和矛盾并不奇怪。

中美之间的分歧，可以概括为6个“T”：1. Theft of nuclear technology——即所谓核技术盗窃案；2. TMD——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3. Trade——贸易逆差问题；4. Taiwan——台湾问题；5. Tibet——西藏问题；6.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即人权问题。这些是双边关系中的问题，今年以来又加上南斯拉夫问题，轰炸大使馆问题，日美安保条约问题等一系列新的分歧。

积极谨慎妥善地处理好这些分歧对中美关系发展攸关重要。关于处理好这些分歧，江泽民主席曾经提出三项原则：始终把握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sup>[9]</sup>

关于第一条原则，始终把握两国间的共同利益。这是要牢牢记住的一条原则。中国有句古话：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如果不是把中美关系的重点放在共同利益上，把握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是一味强调和扩大分歧，就会造成对抗。中美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保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保持两国间的经济交往。其他利益是其次的、第二位的。美国的国内政治在中美关系上起着很大的破坏作用。尤其是到了大选前夕，中美关系往往成为两党争论的焦点，成为牺牲品，就是一个明证。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也应该始终坚持“从大局着眼，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协商”的方针，按邓小平所说的，除了必要的斗争，还要善于妥协，斗争应“有理、有利、有节”。

第二，处理中美关系，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所谓“登高望远”，就是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到21世纪的远处。凡事胸怀全局，不要因小失大，丢了芝麻，丢了西瓜。

美国有些人，尤其是一些新闻媒体，喜欢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蓄意丑化中国，把中国妖魔化。比如什么“献金案”、“盗窃案”搞得满城风雨，最后并无真凭实据。新闻媒体的“炒作”往往容易伤害中美关系。我们这方面也要十分注意。

第三个原则是“切实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江泽民主席强调“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键。”<sup>[10]</sup>

建国五十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当美国按三个联合公报办事的时候，中美关系就发展；而当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手脚时，中美关系就倒退。

台湾问题确实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这不仅为过去的历史所证明，也为最近的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所证实。尤其是最近李登辉猖狂搞台独，提出“两国论”，使这个问题更为敏感和更加严重。

需要提醒的是，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有成约在先的。那就是三个联合公报，一个联合声明和美国总统表示的“三不”政策。其核心是“一个中国”原则，关键是美国应停止对中国主权和内政的任何干涉。

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中国人民有智慧、有能力自行解决台湾问题。美国能否完全做到言行一致，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真正的试金石。

1999年美中关系的这次危机表明，建立双边互信机制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制度化保证。互信机制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搞好两国关系要讲原则；(2)双方要有改善关系的诚意；(3)在处理问题时要注意尊重对方；(4)要言行一致，说到做到；(5)求同存异，扩大共识；(6)保持高层接触，开展战略对话。

1999年美中关系的这次危机，象过去的几次危机一样，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最终将会过去。它所经历的一条曲线，就象建国五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轨迹一样。中美关系曲

(下转第23页)

1999年版,第203页。

[7]Wernet Weidenfeld, "The Euro and the New Fa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Winter 1999,p.77.

[8]参见C.Fred Bergsten, "America and Europe: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8, No.2, 1999, p.20.

[9]参见 Werner Weidenfeld, "The Euro and the New Fa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p.69-70.

[10] Martin Feldstein, "EMU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6, No.5, 1999, p.68.

[11] 参见William Wallace and Jan Zielonka, "Misunderstanding Europe",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7, No.6, 1998, p.67.

[12]参见[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188-189页。

[13] C.Fred Bergsten, "America and Europe: Clash of the Titans?" p.30.

[14]《是对塞尔维亚人的战争还是对欧洲人的战争?》, [法]《世界报》1999年4月22日。

[15]赵怀普:《战后美国对欧洲一体化政策论析》,《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30页。

[16] William Wallace and Jan Zielonka, "Misunderstanding Europe", p.67.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欧盟研究所98级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13页)

曲折折,一直在时起时伏中来回摆动,在时好时坏的反复循环中逐步发展。21世纪的中美关系,也许还不能完全脱离这种发展轨迹。每一次反复,会使美中两国的人民和政治家加深对中美关系的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从而自觉地按照这些客观规律办事,把中美关系向前推进。

我们坚信;按照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十六字方针,我们既敢于斗争,又善于合作,就一定能把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0页。

[2]见《人民日报》评论“努力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1998年6月18日。

[3]江泽民主席1994年11月15日在第二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见1994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4]转引自John Wilson Lewis在上海社科院的谈话,1999年7月29日。

[5]杨洁勉:《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1996年5月电视专题片解说词。

[6]周敦仁:《中美经济贸易关系》,选自《曲折的历程——中美建交20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95页。

[7]江泽民主席1994年11月15日在第二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见1994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8]克林顿:在华盛顿美国全国地理学会就21世纪的美中关系发表的讲话(1998年6月11日),《克林顿访华言行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9]江泽民主席1997年3月26日会见美国副总统戈尔时的讲话。

[10]江泽民主席1997年3月28日会见前美国众院议长金里奇时的谈话。

(1999年8月12日完稿)

(倪世雄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庄建中系上海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